

# 《群经音辨》之语言学价值

周 怡

【摘 要】 《群经音辨》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在语音方面,它为“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音”的说法提供了有利的佐证。书中揭示了古代声母“浊音清化”的规律,反映了“变调构词”的语言现象,提供了丰富的异读词材料。总之,《音辨》在语音、词汇等方面都体现了其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价值。

【关键词】 《群经音辨》;语言学价值;语音;词义

【中图分类号】 H1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2)03-0073-4

《群经音辨》(以下简称《音辨》)是北宋时期贾昌朝所著的一部辨析异读字的辞书,在古代是一部很有影响的正音工具书,至今仍流传不衰,是考证我国经籍古义的一部重要参考著作。

贾昌朝一生博学善论,此书为其侍讲天章阁时所上。全书共收录1124个异读字,凡群经之中,一字异训,音从而异者,汇集为四门。卷一至卷五为“辨字同音异”,仿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发字例,依许慎《说文解字》部目次之;卷六曰“辨字音清浊”、“辨彼此异音”、“辨字音疑混”,皆

因《经典释文》序录所举,分立名目;卷七为“附辨字训得失”一门,所辨论者仅九字。全书辨析详尽,所辨亦多有可取。特别是《经典释文》散见于各经之中,颇难检核,《音辨》一书,则汇集其音义,丝牵绳贯,同异粲然。《音辨》在本质上是一部音义著作,而音义类书的特点就是以音明义,音明则义显,前一至六卷汇录了1124个异读字头的2600多条音义资料,是汉语言文字研究的资料宝库。《音辨》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语言研究上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作者简介〕 周 怡,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四川 成都 610041。

## 一、《群经音辨》语音方面的价值

此书依音辨义,根据读音的不同反映词性的变化,对于音变构词的研究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是我国第一部词性和词义转变的词典。全书收录的1124个异读字,实为多音字的详细辨析,因此也可以称为我国第一部多音多义词典。我国古代的字典、词典,一般是全面收集字、词,从形、音、义几方面去做注释。古人读书,并非不注意正音问题,如梁朝沈约就曾“病世俗不能辨其音”。为了正音,古代有些学者,曾给经典注音,因而有沈熊的《周易音》、王俭的《尚书音》、鲁世达的《毛诗音》、李轨的《礼记音》和许文远的《春秋左传音》等,至于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是注释诸经音义的,《玄应音义》与《慧林音义》是给佛经注释音义的。这些书都不是对多音多义字做综合整理,正如王观国在《音辨·后序》所说:“中国自有经籍以来,未尝无音。”“非无音也,无音辨尔。”<sup>[1]</sup>因此可以说,《群经音辨》是我国第一部多音多义字手册,贾氏的工作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它有助于读书人正音辨义。所以王观国说:“音辨之行,固非小补,汉、唐《艺文志·笺注》之书有曰音隐、有曰音略、有曰音义、有曰音训、有曰音钞、有曰释音,是其音未必能辨;有曰辨证、有曰辨疑、有曰辨嫌、有曰辨惑、有曰辨字、有曰注辨,是其所辨未必皆音,独杨休之著书,号辨嫌音,又皆芜累不经,为魏收所薄。”<sup>[2]</sup>九百多年前,贾氏第一个编出这部具有特色的、独一无二的、有实用意义的辞书,筚路蓝缕,在中国辞书发展史上,也是应该写下一笔的。

元延佑、至治年间,苏州李伯英曾用十年时间编成《类韵》三十卷,清朱彝尊在《字鉴》跋文中指出:李伯英“受其父梅轩处士之旨,以六书惟假借难明,于是就典籍中字同音异者正其字画,辑《类韵》一书。”<sup>[3]</sup>《类韵》是在《音辨》出现两百多年之后编成的另一部古代多音多义字辞书,有可能是受《音辨》的影响编撰,可惜《类韵》已佚,无法考证。由于《类韵》失传,《音辨》便成为我

国存留下来的唯一一本古代多音多义字手册。

### (一)类隔切改为音和切

在语言学史上有“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之说,陆德明音中轻唇与重唇音、舌头与舌上音也是不分的,大徐音、《广韵》音也部分地存在这种情况,贾氏对这部分“类隔切”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良,比如:脾 必尔反、方尔反(陆音)、牌支切(贾音);靡 亡皮反(陆音)、模彼切(贾音);幕 武博反(陆音)、模各切(贾音)等等。通过对陆音和贾音的音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陆德明音中本为唇音或舌音类隔的反切,《音辨》中都已改为音和切,这一方面反映了《音辨》对异读字读音的规范,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语音的发展和演变,说明贾昌朝在编纂《音辨》时,语音系统中轻唇音与重唇音、舌头音与舌上音已明显分化。因此,《音辨》所包含的大量此类音切资料不但为钱大昕所提出的“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音”说提供了有利的佐证,而且对轻、重唇及舌头、舌上音发生分化的时代考定,也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 (二)浊音清化

为了录存众读,陆德明往往在一个字头下备列多个音切,因此《释文》中的又音数量繁多,贾昌朝在对其加以整理时,为了增强音义结合关系的稳定性,一般选定其中的一个反切,尽量不列又音。尽管如此,《音辨》还是保留了一部分又音音切。其中,有些又音字的不同音切分属清浊两类,从这类又音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隐含的语音变化规律。比如:苛,呼多切(晓母)、胡歌切(匣母);铉,都门切(端母)、徒对切(定母);樊,方元切(非母),附袁切(奉母)。通过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贾氏皆标有清、浊两读,这说明此字在当时已经出现了清音的读法,但浊音一读还没有完全消失,因而一般在首音位置标注清音一读,同时在又音中保留浊音一读,或者以“清浊二切”的形式标注,反映了语音由浊到清递变的痕迹。音韵学界曾揭示了古今声母变化中的“浊音清化”规律,《音辨》中的此类音切材料正是这一语音规律的有力证据。

### (三) 浊上变去

古全浊声母的上声变为去声,是汉语语音史上的一条重要规律,这一规律在《音辨》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在《音辨》中变去声的占据了变调构词总数的75.6%,去声都体现为变调之音读,又是后起之音读。比如:采,仓宰切、仓代;切雨,力奖切、力让切;临,良寻切、力焚;切共,九容切、九用切;借,子亦切、子夜切;乞,去乞切、去既切;五,于方切、于放切;妻,七奚切、七计切。

通过例证可以看出,去声是适应了上古汉语的特点而产生的。上古汉语单音词占优势,屈折作用只能在一个音节内发生,去声的出现,就是这种屈折作用的一种反映,并以此区别意义,从而增强了单音多义词意义表达的清晰度,利于言语交际。

各例以意义转变为主,有些词的语法作用也随着意义的转变而转变。无论异读间表现为语法意义的差别,还是词汇意义的不同,其读音大都表现为去声与其他声调的差别。很明显,正是去声将后起义与基础义区别开来,从而起到别义作用。由此我们可以说,段玉裁的“古无去声”说大致正确。这一结论从《音辨》的四声别义字中取得了参证。去声表现出来得独特位置表明:去声既标示后起的意义,又是后起的声调。当我们把四声别义字所区别得意义展示出来时,就可以理解,去声成为变调的核心不是无缘无故的现象了。

## 二、《群经音辨》词义方面的价值

九百多年前,贾昌朝之所以能编撰出《音辨》,是由于他有比较正确的语言学观点,不受字形的束缚,认识到字音与字义有着直接的联系。

汉字是表意文字,古代有人习惯上“依形辨义”,忽略了语音与语义的联系。殊不知由于汉字的演变,形、音、义之间存在种种关系,如朱起凤在《辞通·自序》中所说:“有一字数音者,有一音数义者,有同音借义者,有协音借义者。”<sup>[4]</sup>有的字,一字多音多义,字义是随字音的不同而不同

的,应从读音的不同来考察字义的差别。尚若受字形的束缚,拘泥于“依形辨义”,就可能出错。故王观国在《后序》中说:“文同而音异,旁及史传,诸子百家,音杂字丛,盖亦不胜其讹矣!”<sup>[5]</sup>不弄清这种多音多义现象,就可能“句读不明、师承谬戾”<sup>[6]</sup>。清代不少有成就的学者,由于能突破字形的束缚,重视声韵,因而解决了一些古籍中长期存在的疑难与“谬戾”。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说:“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sup>[7]</sup>对此,王力先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它“标志着中国语言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摆脱了文字的束缚,把语音跟词义直接联系起来,这样做,实际上是纠正了前人把文字看成是直接表示概念的唯心主义观点。”<sup>[8]</sup>看来,在王引之之前的800年,贾昌朝已有类似的语言学观点。《音辨》之作说明了这一点。贾氏在《音辨》的序言中,对此有着明确的阐述,他说:“一字之中,彼此相形,殊声见义,如求于人曰假,与人曰假(音价)。”还有“如上上(时亮切、时掌切)下下(胡贾切、胡嫁切)之类”,是“随声分义”的,因而“一字之文,音诂殊别者众,当为辨析。”<sup>[9]</sup>九百年前,贾氏能有这样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音辨》系统地汇聚了异读词各个义项的原始资料,其中的每一个异读字字头,都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义项,而每一项又都显示了不同的词义信息,如本义、引伸义(包括破读义)、假借义等,是古代异读词词义系统的真实写照。从贾氏对各音义项的安排来看,它所保留的异读词词义呈现出较为严密的系统性,即通常将异读词的基本义所对应的异读词条放在最前面,然后再列训诂义。因此,我们可以较为容易地分辨出异读词的词义类别和层次,通过对不同类别的词义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就能展现某个类聚中词义的普遍联系性和发展演变的脉络,从而建构该类聚的词义源流系统,揭示词义运动的规律。比如:牙,齿也,五加切、车輶也,五驾切;分,别也,府文

切、限也，扶问切；披，张也，普碑切、分也，普彼切。

《音辨》在词义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所列示的古汉语异读词词义信息是阅读古代经典的津梁，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古汉语中众多的不同类别的词义材料系统而又完整地汇聚到了一起，是对古汉语异读词词义系统以及词义的发展变化进行研究的重要资料。

综上所述，《音辨》在语音、词汇等方面都体现了其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价值之所在。

《音辨》不仅正音，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很多资料是《说文》、《广韵》、《玉篇》等书中所没有的，类似这样的材料，颇有参考价值。正如《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提要》云：“然释文散见各经颇难核检，昌朝会集其音义，丝牵绳贯，同异粲然，俾学者易于寻省，不为无益，小学家至今不废亦有以也。”<sup>[10]</sup>

当然，受到历史的局限，贾氏对多音多义字的

归类并不尽科学。《音辨》卷六提供的材料很有研究价值，他冠以“辨字音清浊”之名目。其实，所收之字，其读音的差别，有许多只是声调不同，有的是声母不同，有的是声调与声母都不同，声母清浊的不同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而且所占比例并不多。《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提要》中说：“书中沿袭旧文，不免谬误者，如卷一言部：谦，慊也，郑康成说谦为慊，慊，仄也，仄谓闭藏貌。据《礼记》注：谦，读为慊。慊，仄也。此解正文，自谦。注又曰，仄，读为廩，廩闭藏貌也。此乃解正文仄然与上注仄足之仄绝不相蒙。昌朝混而一之，殊为未考。”<sup>[11]</sup>这种考证不详的错误还有几处，如卷二典，坚韧貌也，但据《考工记》“辘欲颀典”注曰“颀典，坚韧貌。”<sup>[12]</sup>（是以“颀典”二字为形容之辞，不能单举一“典”字训为坚韧。）不过，瑕不掩瑜，在今天看来，此书在语言学史上，仍然有很高的参考、研究价值。

#### 【参考文献】

- [1] [2] [5] [6] 宋·王观国. 群经音辨·后序[M]，《四部丛刊续编》本。  
[3] 清·朱彝尊. 字鉴跋[M]。泽存堂五种本. 康熙五十三年。  
[4] 朱起凤. 辞通·自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5。  
[7] 王引之. 经义述闻[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8] 王力. 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 群经音辨·序言[M]。《四部丛刊续编》本。  
[10] [11]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提要[M]。  
[12] 郑玄注. 周礼·冬官考工记·辘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责任编辑 苏 宁）